

中国的耕地在缩减,种粮的农民在减少,粮食的进口在增加,国际粮价在飙升……中国的粮食安全吗?

正确应对粮食安全

□本报记者 杨新美

几年前,在“粮食安全”这个字眼成为举国关注的问题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这样一群人,他们花费了近一年时间,研究中国粮食安全背后隐藏着的问题。随后,于2008年底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进行了发布,并还召开了两次专家研讨会进行交流、探讨。

当时,天则经济所给出的结论引起很大的反响和争论,社会各界对其褒贬不一。尔后,针对来自专业或非专业人士所提出的问题和给出的意见,课题组开始以积极的态度审视和借鉴,并对报告作出了几次修订,以此完善课题。

为使公众更好地了解本研究报告研究成果,从而明晰中国粮食安全的状况;考虑到广大公众对粮食安全的确有很多的疑虑,天则经济所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延伸,由课题组的主要负责人茅于軾、赵农编撰了这本《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

本书从经济学研究角度,在全球化背景下,综合研究了粮食安全的相关问题,认真审视、严密推断、简洁立论。两位作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课题组的主报告和8个分报告。首先从粮食安全问题上着手,证明了“以粮食安全为由设置18亿亩耕地红线”的不确定性,但其本意还在于对运用计划手段配置土地资源的否定与批判。粮食问题并不等同粮食安全问题,我国历届政府抓粮食不放松,多年来成效可观,库存殷实,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开放思路,积极参与粮食的国际贸易。收放自如的粮食政策有助于我们抵抗“百年一遇”的“粮食危机”。

“不懂粮食安全的外行在这本书中能看到‘热闹’,而研究这一问题的人也能在其中看到‘门道’。而热闹看多了,也能逐步看出门道。”该书的责编崔玲评价说。本书的目标读者一方面是关心国家农业经济、关注国家粮食安全、关注粮食国际贸易、关注耕地保护的经济学家和相关研究人员;另一方

面,是关心民生问题、关心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普通大众。

本书由上、下两篇构成。上篇为“对话粮食安全”,就报告的内容予以解释,并针对公众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释



《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茅于軾、赵农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定价:25.00元

□采访者:本报记者 杨新美
□受访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赵农

粮食安全是否真的存在?

《科学时报》:人们对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饥荒依旧记忆犹新。也因此,粮食问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我国有没有粮食安全,或者这一问题对目前来说是否那么重要?

赵农:我们观点与以往的不同: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问题都无须担忧,可以说其他社会经济问题远远要比这一问题重要得多。

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并不是某些个别群体或是某一特定阶层因为收入因素而买不起粮食,而是指国家层面的粮食供给量是否充足。

目前,从我们自己的生产能力来看,我国每年能生产粮食5亿吨,

疑惑感,如粮食安全是否就是日常的食品安全,农民不种地了粮食哪里来,如何判断我国的粮食是否安全,退耕还林是否会影响到粮食产量,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耕地需要保护”,无人种粮了怎

粮食安全该走什么路

么办,粮食是自给自足安全还是

有进出口更安全。下篇为“解读粮食安全”,是修订后的课题主报告,以方便读者查阅。

赵农说,这100多个问题都是百姓非常关心,却一直没明白

政策。在人们看来,耕地逐渐减少已经到了危及粮食安全的程度。

赵农:一般人认为中国工业化会不断地消化我国的耕地资源,所以若不严格限制的话,耕地资源很容易就消耗殆尽。但实际上目前来看,我国耕地的使用还有一定程度的空间、余地。

目前,农业技术在发生改变,播种面积并不等于播种面积,播种面积实际上是耕地面积乘以复种指数。

如果一亩地一年可以播种两次,就应该是耕地面积乘以2,如果可以播种三次,就应该是乘以3。

当然,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还会继续占用耕地,但这种消耗还是有极限的。

假设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还需要5亿农民进城,进入城市后,每平方公里容纳5000人,如果占有的全是耕地,这个极限值就是1.5亿亩。

《科学时报》:18亿亩红线背后意味着什么?

赵农:这条红线初衷是好的,但是土地配置机制的核心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耕地红线,是国际计划配置土地资源产生的问题。所以天则所不是针对18亿亩耕地红线,而是针对这18亿亩耕地红线后面的计划配置机制。

土地主要有3个用途,农业生产、工业与建设、生态环境。中国的现状是,政府通过计划来决定耕地数量和土地用途。

在工业和建设用地上,政府还充当了土地价格(征收价格和出让价格)的制定者和土地的垄断中间商。

国家先将土地征用,然后开发商在政府手上再购买土地。因此地

方政府参与了土地的运营过程,而且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此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地方政府在高额利益的驱使下大肆侵占土地。

中央政府基于社会稳定和粮食安全的考虑,反过来提出18亿亩红线来约束地方政府。这也表明,计划管制存在一些问题,又进一步通过更高级别的计划管制加以控制和纠正。

如此恶性循环,可谓“因为管制,所以管制”。

也正是因为在这种土地的计划经济下,失地农民的利益不能得到切实的保护,农民无法分享到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果;工业与建设用地的存在大量浪费;土地腐败愈演愈烈;房地产价格直线上升。

计划还是市场

《科学时报》:众所周知,土地是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正因为稀缺,才需要更加合理地配置和利用。究竟土地应该以何种方式配置才可以解决农民利益被侵害、耕地被侵占的问题?

赵农:土地配置不应该是国家计划的方式。究竟如何配置土地才最为合理?理论与实践都已经证明:运用市场机制,而不是计划手段,来配置土地以不同的用途,才会达到效率的最优化。

首先,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希望政府从土地经营中退出。省略了政府作为中间商而增添的环节。这就需要完善农民的土地权利,需要保护土地的产权,改变现有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现在的征地制度与政府供地制度,需要让资源与要素的价格发挥作用,让土地在市场机制下交易与流转。

本因素,就是这些人。更何况,这些人曾经奋发前进、勇于面对困境,虽然他们也偶发的贪婪、软弱,虽然他们的基因里也有背叛和虚伪,但放到一望无际的历史当中,这些人无疑是伟大的、爱国的。所以,我情愿做一个守墓者,即使你难以咽下这些文字,我还是要一笔一笔地记下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看清那个年代的中国。

陈伟成为历史学家了。我最佩服历史学家,那么破碎,分散,看起来似乎偶然连续,没什么互相联系的点点滴滴,对所谓“客观”的史实进行最为“主观”的汇总、加工,甚至编造,大多数肯定属于没完没了。就像大数人看不出我喜爱马林松的心情一样,大多数人不会明白历史学家凭什么、包庇我,也不太行白。

2010年11月13日上午10时,我写这篇序的截稿日期,我终于拜读完陈伟的《日本商业四百年》,最后一段写的是这样的:

就在日本商业界陷入混战,咒骂与欲望泛滥而出的时候,在大阪,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扛起了工具箱,挨家挨户地推销产品。他只上过两小学,父亲生意失败后,家道衰落,生活拮据。于是,小男孩给自己一个电器商做了学徒,开始了自己艰苦的赚钱生涯。

但没人能想到,正是这个看起来赢弱的年轻人在23岁的时候创立创业,建立了一家电器制作所,70年后,他的收入跃居日本第一,在他逝世的时候留下了15亿美元的庞大财产。他创立的企业名垂青史,也成为三井财团的坚韧一环。

这个人叫松下幸之助。我立即反应道:“哦,不是400年吗?怎么只有近代史,而没有二战前后的故事呢?你连日本战后奇迹都省略掉了?难道你作为中国人觉得二战不重要啊?你这样岂不荒唐了。”

动不动就把手手机拿来,给陈伟打电话,他就像平时一样,带着一种帅气的冷静给我解释:“噢,我还没写完呢,我要写几本,这不是第一本。”我说:“噢,这样子,那只是为你这本第一部写点感想就OK了?”陈伟回应道:“对,这样就可以,兄弟拜托了。”

我很高兴能够为异国他乡的兄弟,以异国他乡的文字对陈伟表示祝福,我也期待他的下一本,下一本,甚至,下下一本。

(本文为《日本商业四百年》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尹洁

作为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普利策奖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国界。尤其是其中的“公共服务奖”,几乎是“家喻户晓”。然而,遗憾的是,引起人们关注的总是报道的事件本身,新闻工作者却被摆在了史册之外。新闻界和学术界对普利策金奖90余年的获奖报道没有作系统研究,对获奖报道的选题、调查、修改、定稿以及背景等缺乏了解,民众包括新闻界后辈对得奖报道背后的故事,特别是幕后人士贡献的了解就更少。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记者与真相:普利策金奖的故事》一书填补了这一空白。

从1917年创立至今,普利策金奖走过一个世纪的征途,穿透历次战争的硝烟、政治丑闻的迷雾和社会问题的困扰,矗立在最高处的金字招牌是其新闻奖项中的“公共服务奖”(普利策金奖)。由于其公益性,普利策金奖只颁发

揭开美国新闻业的幕后真相

给新闻机构,不属于个人。这个通常只颁给那些系列报道严重社会问题的报纸的奖项,成了美国报业媒体梦寐以求的金苹果,正如电影界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一样夫复何求。美国业内以赢得普利策金奖的多寡来判断报纸优秀与否。达到5枚的当年最高纪录,《洛杉矶时报》用了61年的时间,而《纽约时报》则花了86年。在美国报业每况愈下的今天,这个奖项依然代表着新闻界的最高褒扬,它的魅力何在?《华尔街日报》洛杉矶分社的前副社长罗伊·小哈里斯以资深专家的角度,撰写了这本《记者与真相:普利策金奖的故事》。

容易忘记历史或许是世界上所有年轻人的通病,所以本书作者说:“这本书是写给那些想要了解近期和过去重要新闻事件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院校的学生的,关心新闻和社会互动关系的美国历史爱好者也能在这本书中发现它的价值。”这价值是什么?当报业面临读者群的缩小、互联网的挑战和营业利润的滑坡时,“社会责任”却是新闻从业者永远不能抛弃的一条守则。本书详细记述、

分析了普利策金奖作品的经典案例,援引了大量优秀作品背后的故事,来说明媒体责任对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公共服务性报道的重大意义。

全书开篇便是2005年的卡特琳娜飓风。当暴风雨阻断新奥尔良的一切公共交通和通信线路时,《时代花絮报》和《太阳先驱报》的编辑人员坚守“孤岛”,记者们则各显神通送出一线的真实情况。在随后的系列报道中,记者们逐条核实传闻,澄清谣言,“坏事是有的,但我没有看到杀人、强奸、割喉之类的惨剧”。客观、权威的报道最终使普利策金奖破天荒地颁发了一次“双黄蛋”,两家报纸并列获得了2006年度的“公共服务奖”。

“公共服务”代表着普利策奖的最高价值,因为它涉及最多多数人的权益。具体事件包罗万象,但总归不离权力滥用、种族问题和天灾人祸几大类。在社会文明的进程中,人类最大的敌人始终是自身的弱点,也许我们永远无法消灭它,但至少可以约束和监管它,站在代表最多数人利益的角度上,媒体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桅杆上的瞭望者”,为避开暗礁而吹响预警的号角。这个岗位是如此重要,如此风光,又如此辛劳,那些艰难险阻不仅埋伏于途中,也潜藏在身边。

在书中,作者援引了大量细节来还原新闻报道的面世过程,越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作品,经受的考验越是严峻。1927年,《坎顿每日新闻》的主编唐·梅里特由于批评当地官僚们同犯罪团

伙关系密切而被谋杀;1953年,《怀特维尔新闻报道》和《塔博尔市论坛报》因为揭露了三K党在当地的死灰复燃,受到了经济利益和生命安全方面的双重压迫;2001年,后来臭名昭著的记者杰森·布莱尔在“9·11”事件系列报道中试图捏造文章,所幸被《纽约时报》的编辑识破而没有得逞。连普利策金奖理事会成员也提醒:“种族问题的报道必须十分准确,不能有任何差错。否则,就有可能引起群体的愤怒、示威,甚至全体暴力行动。”

令新闻业骄傲和欣慰的是,这些公共服务性报道由于其巨大的社会意义而获得了最广泛的支持和肯定,即使是某些带有争议性和颠覆性的问题,也因为媒体报道的真实和客观而受到人们的欢迎。2002年,《波士顿环球报》的“聚光灯团队”曝光了他们在两年时间里收集到的、当地天主教会神父对儿童性侵犯的材料,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其员工担心



《记者与真相:普利策金奖的故事》,[美]小哈里斯著,贾宗谊、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定价:39.00元

的天主教徒围攻报社一幕并没有出现,“是的,人们无比愤怒,但不是针对我们,而是把矛头指向他们所热爱的天主教”,其主编马丁·巴伦因于“我们的报道是无可争议的,所有的事实都确凿无疑”。

当然,被揭露一方有另外的看法。因1974年的水门事件而断送了总统生涯的尼克松,曾经语带嘲讽地说:“他们不是由于‘支持’而获得普利策奖,而通常是由于‘反对’才获得这样的奖。”但对于因报道“水门事件”而留名新闻史的两任《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来说,那年的普利策金奖差点把他们的作品踢出局外,甚至有位评委说“水门事件只不过是象屁股上的一个小疙瘩”,但仅仅两个月后,“小疙瘩”就成了大肿瘤,评委们无不庆幸地意识到:“如果颁奖发生在两个月以前,《华盛顿邮报》没有得奖,那将是极端尴尬的。”

近100项普利策金奖的背后,是无数喜怒哀乐的故事,类似的故事可能发生在世界任何角落,一个社会事件的新闻价值几何,站在不同的角度,将得出不同的答案。从1948年的《圣路易邮报》报道伊利诺伊州“难”,到1978年《费城问询者报》揭露当地警察滥用权力,到1969年《洛杉矶时报》曝光洛杉矶市政府两个委员会的腐败行为,到2004年《纽约时报》调查美国工人的死亡事故问题,普利策金奖作品涵盖了美国社会从元首到平民、从华尔街到贫民窟的各个领域。在今天的读者眼中,这些当年的新闻已经变成故事,而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唯有在书中才能细细品味了。记者与真相或许都会随雨打风吹去,唯有公共的精神和力量亘古长存,推动社会发展的车轮滚滚前行。

编辑荐书



《像遭遇一样忧伤》,钟立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定价:29.80元

这是新民谣代表人物钟立风的精选文字集,包含断想篇、随想篇、访谈篇、电影的记忆、小说时间等几个部分。作品用诗意的语言表达缤纷的情感和情绪。其中,断想篇有泰戈尔、纪伯伦哲理小诗的气息。小说则充满了隐喻的意象和寓言。正如钟立风所说,书中充满了随想、闪念、幻想、奇遇、谜题、浅睡;奔跑、冲刺、跳跃、撒欢、飞翔、迷路、遗忘;短得像三分钟凉水澡,洁净、精微、禅意,考验你的智力和趣味……配合本书,有作者从未发布过的单曲《像遭遇一样忧伤》。

解读日本商业的精神密码

□加藤嘉一

我有一个好哥哥,叫涩泽健(Ken Shibusawa),是日本著名的投资家。曾在摩根士丹利、高盛集团等美国著名投资银行从事多年金融业务的他,至今已经独立,为个人投资者提供服务,把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的本钱反馈给社会需要的领域。他始终在思考,金融资本如何超越短暂、狭隘的视野,站在维护并推动国家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去决定把钱投给什么领域,什么企业,什么人。因此,他演讲、投资、关注的往往归结于所谓“社会”领域。他也始终在摸索资本主义走向何方。

他是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Eiichi Shibusawa)的第五儿子。他对涩泽荣一的忠诚心特别高,并拿着祖辈的著作《论语与算盘》,到处给性地陷入拜金主义和互不信任的金融从业人员讲“资本该拥有的作用和责任是什么”。

涩泽荣一将儒家学说引入到了经商当中。《论语与算盘》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正是日本工业化浪潮风起云涌之际,很多年轻人投身商海搏击风浪,渴望获取巨大财富,一种拜金精神侵蚀人们的大脑。涩泽健大哥曾跟我讲过许多荣一先生的故事和智慧,其中,让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句哲理:“商业的发展必须以社会伦理为根基,否则会把人引入歧途。企业赚取利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是为了给社会创造财富。”

原来,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和西方后来的资本主义,是可以不冲突的,甚至互补的,一切都是为跨越国家和地区,跨越时间和种族内,即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皆发展、科学发展而服务的。企业家是最需要社会责任感的,并把它作为实际行动来反馈给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去,使它和谐而长远地发展下去,否则,一家企业的命,很有可能是昙花一现,甚至陷入历史的泥沼。而这些企业蔓延的国家,自然而然地衰退,甚至灭亡。

我没有想到,涩泽健大哥引用向荣一先生的格言竟然能够被中国“80后”——好兄弟陈伟所用。

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日本“80后”曾在中学历史课堂上学过一点知识。中国朋友们相当熟悉的明治维新的时代,武士人们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不愿意去想如何赚钱的问题,国家财政陷入崩溃边缘,这是切实的国情。“士农工商”的潜规则无处不在,如何化解武士与商人,这在当时日本价值体系中两个极端的共存和协调,才是荣一认真思考的问题。

历史永远是一脉相承,真实的历史永远是跨越时空的价值,并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从中国古代的儒家到前朝资本主义,从后金金融化后的资本主义,又回到改革开放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在这个探索知识结合点的旅程中,日本那样小小的岛国的“兴衰史”,也有幸能够为大家理解历史的脉络,发展的接口以及未来的方向,起到一点作用。而这工作是被一名中国“80后”正在完成,意味深长,令人欣慰。

陈伟的《日本商业四百年》,引用他给我的资料里文字的话,是“一套描写日本商业如何崛起,财富如何积累的书,从一个侧面告诉读者日本崛起的精神密码,阐述另一种不为人知的商业模式如何席卷世界”。

陈伟跟我说,“震惊世界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不过有200年的历史,而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日本各大财阀的生命岂止延续了400年?”

这个问题意识不错,让我深思祖国的历史。这本书涉及到的公司包括三井家族、安田家族、住友集团和三菱集团,用生动的细节描述他们的创业故事,经历的风险以及获得的荣耀。“他们大都游走在政治与金钱的边缘,用独特的方式塑造着自己的商业帝国。他们时而阴险狡诈,时而又充满关怀,他们复杂多变却又坚定勇敢。”

商社(Shosha)是奇怪的玩意儿,词典上的直译就是“贸易公司”,却远远超出了贸易本身的范畴。他是日本特色的灰色公司形态。在当代的日本,许多运动员、社团领袖、社交谈判能力强的人纷纷进入商社。公司要求员工拥有国际视野,情报收集能力,谈判能力,还有不可或缺的是,喝酒的能力。这样说,中国朋友们或许容易理解吧。



《日本商业四百年》,陈伟著,京华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定价:34.80元

他们往往在国内外与当地的政府勾连在一起,不断创造应酬的机会,从中寻找商机。我前一段时间在北京跟三菱商事中国代表处的二把手吃饭、喝酒,他说:“我们就是用一切手段创造商机,为此需要的是有3种要素:Resource(资源),Strategy(战略),System(制度)。”可想而知,它显然是综合而微妙的商业模式。

对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陈伟注意到教育体系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日本,是日本历史上最美好的年代,激情洋溢,进取心如同初升的朝阳普照万物。更重要的是,国家教育水平的直线提升直接引导了日本商业的变革。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各种学校遍地开花,推动倒幕成功的武士精英们各个文武兼备。明治政府成立之后,更是把国民教育放在了改革的首要位置。1872年,政府开始推行4年义务教育,无论男女孩子都要上学读书。政府的宣传口号是“在村中无人不读书,在家中无人不读书”,掀起了全民读书的热潮。后来,岩仓卿四人从西洋回来之后,更是大力推广“法国、美国式”的教育体制,设立小学和大学,然后采取征兵制类似的方式把上学读书当成国民必须要履行的义务,更加可贵的是,日本政府给学校作了开放的定位,要求学生“实务学习”、“独立思考”,特别是后一点,今天的中国大学里还没有被

当做宗旨贯彻、延续。

陈伟在整个描述中也没有忘记适当跟祖国的历史和社会对比起来,进行进一步的思索。他考虑到祖国同胞的面子,相当客气地提了一句:“中国百日维新为什么会失败?原因众多,情况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对文化、对教育、对学者的态度束缚了中国前进的脚步。”

19世纪下半期,就是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其高等教育水平促成了商业繁荣,直接推动了国家的兴起。政府贯彻的则是让优秀的人才“走出去”,派遣到西方,把西方先进的制度和技术“引进来”。当下的日本统治者相当明白,国家内部正处于改革、转型的时候,统治者需要正确利用外压,来化解内耗,强有力地提高经济生产力。

看看今天的中国和日本,我想,中国人从历史的挫折中学习了太多,把“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重要思想落到实处。日本人则始终沉淀于以往的辉煌,无法摆脱失落的20年。失落还要持续多久呢?难道成功是失败之母吗?

陈伟平时做时尚杂志编辑。在我眼里,中国男性中,他是罕见的帅气型媒体人。我知道他上大学的时候是日语,我也知道他学日本的历史、社会、文化等也有较深的了解。我也曾为他上一本书《麻辣日本史》写过推荐语,觉得陈伟对日本历史的描述很独特,很有趣,我这个日本人也学到很多,受益匪浅。日本能有像陈伟这样,不受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负面约束,用一套个性化的语言来描述日本历史的中国朋友,感激不尽。他用自己的方式让祖国同胞更多、更深入了解日本和日本人,并试图从中为祖国吸取可贵的知识营养。

陈伟在本书中介绍并详细描述了日本近代的维新人物们,包括大隈重信、福泽谕吉、伊藤博文等。他写道:

直到今天,有一位出版人说:“别写那么多历史人物了,读者可能根本记不住!而且太像励志故事了。”也许,在他们眼里,我笔下的历史过于复杂了,和这个崇尚速成、快餐、浮躁的世界颇不相容。但我依然愿意坚持自己的初衷,我渴望写出具有价值的故事和历史,那么构成形形色色人类社会的根基